

「那個仲介／媒人有告訴我……」

跨國婚姻仲介與跨國婚姻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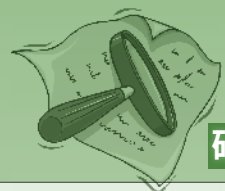
● 王翊涵

英國約克大學女性研究中心博士
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引言

2005年的6月，我暫別英國的學生生活回到臺灣進行一個月的博士論文前導性研究，探討從東南亞國家嫁到臺灣的移民女性的生命故事。因緣際會下認識了陳媽媽，一位運用自己在臺灣與越南的人脈來經營媒合兩地跨國婚姻的仲介。一日，在她的介紹下，我來到阿芳的家裡訪談她從越南嫁到臺灣的心路歷程（阿芳的老公是陳媽媽的國中同學），訪談進行中有五個人在場，我、陳媽媽、阿芳、阿芳的二歲女兒以及她腹中七個月大的胎兒。開始訪談以後，我就驚訝於阿芳那一口很不流利並帶著濃濃越南腔的國語，但我知道她嫁到臺灣已經三年了！在阿芳暫時離開到廚房去泡牛奶時，陳媽媽用一副很專家口吻的語氣告訴我：

她鄉音還很重啦，因為她沒有去上學，我叫她先生千萬不要給她去上學，也不要讓她出去上班，就在家裡帶小孩、照顧家裡就好，你知道的，出去ㄌㄟ會學壞，你看她多乖、多溫柔、多賢慧！國語說不好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她是賢妻良母。



回到家後，我的心情仍是起伏的，令我想不透的是，為何阿芳的老公願意聽從陳媽媽的意見然後去限制太太與外面的互動？似乎仲介與其所媒合的跨國婚姻夫妻的關係並沒有因為外籍妻子抵達臺灣之後而結束，仲介的影響力不僅只在結婚過程，還延伸到這些家庭的生活，影響了夫家對待外籍配偶的方式。

回到英國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我決定將探討參與跨國婚姻的三者（臺灣男性、東南亞女性、仲介）在相親、結婚、以及婚後的互動納入研究。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即是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著重在：跨國婚姻家庭在婚後與其仲介的互動為何？結論中我將探討，爬梳這些主體性的經驗後對於當今政府規範禁止仲介合法化的政策及規劃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又能引起怎樣的反思？

研究形成與研究方法

2004年10月我開始在英國約

克大學女性研究中心的博士課程，負笈他鄉以追求生涯理想的經驗使我對於嫁到臺灣的新移民女性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感受，我認為在跨海的環境之下進行這群女性的生命故事、遷徙經驗、與在地認同建構的研究將具重大意義。此外，「商品化跨國婚姻」成為臺灣社會裡跨國婚姻的多數，藉由此婚姻方式嫁到臺灣的女性被普遍認定是「掏金者」、或「買賣婚姻的犧牲者」、或「可憐的家暴受害者」等；政府以及社會大眾亦傾向將她們以及她們的小孩視為臺灣社會問題的來源；在學術研究上雖然已累積不少的研究成果，然其多著墨在外籍配偶婚後生活適應與子女教養等議題，忽略了她們在相親結婚過程中的經驗述說以及其對自己婚姻生活的主體理解。

西方「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的概念與臺灣的外籍新娘最為相似，其迅速的結婚過程、以及郵購新娘移居到丈夫所在的國家以

後所產生的歧視、家暴等問題，使得女性主義者（e.g. Barry, 1995）開始從性別壓迫、或是男性霸權等觀點來剖析郵購新娘現象。然而部份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從文化與差異的理論架構出發（e.g. Constable, 2003），論證出郵購新娘在結婚過程與婚後能展現能動性（agency），這些研究成果挑戰了以往所建構出的「郵購新娘是受害者」的論述。

在感受到國內既有文獻的不足以及在新興的女性主義理論的啟發下，我的博士研究開始成形，意欲從「差異」與「文化脈絡」觀點來呈現新移民女性的聲音，探討其如何理解自己婚姻遷移的經驗、如何發展出在地認同。為了能以多元的面向來描述這群女性的故事，我同時含括了臺灣先生的經驗敘說。

在研究方法部份，正式的田野調查於2006年的1月到6月間進行，場域在南臺灣，主要從參與兩個民間團體來招募受訪者。以「深度訪

談」收集資料，共有18位女性（九位越南籍、六位印尼籍、三位柬埔寨籍）和九位男性（七位娶越南妻子，二位到印尼娶妻）參與。除了三位女性，所有受訪者均是透過跨國婚姻仲介而結婚。

婚姻「諮詢者」與「教導者」

本篇文章主要呈現跨國婚姻家庭在婚後與其仲介的互動為何。在開始討論之前，有必要將臺灣、越南、印尼、與柬埔寨等地的仲介類型作簡要說明。

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在鉅觀與微觀等因素的箝制下，藉跨國婚姻尋出路，然而因為語言隔閡與繁複的申請程序，依賴仲介服務的需求變得迫切，一位受訪者就說：「沒有那些仲介幫忙喔，我怎麼到越南娶新娘啊？那在國外啊！怎麼娶？」兩地仲介業者因應而生，而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仲介更是對於臺灣與東南亞跨國婚姻的快速增加有著重要影響（Wang & Chang,



2002)。仲介在臺灣包括兩種，一種是由外勞仲介業、婚友社等轉型或兼業的「公司仲介」，另一種是個人目前或曾經在東南亞國家住過或工作過、或是其本身是娶外籍配偶，所以熟悉門路的「個人仲介」。九位受訪者中，有七位是透過與其有親戚朋友關係的「個人仲介」跨海娶妻，二位是選擇「公司仲介」的服務，他們習慣稱「公司仲介」為「仲介」，稱「個人仲介」為「媒人」。在東南亞，媒合年輕女孩參加相親的仲介亦包括兩種，一種是與女孩沒有任何關係的「工具仲介」，另一種是「人際仲介」，可能是女孩們的鄰居、朋友、同學或親戚等，這些「人際仲介」多數都是已嫁入臺灣的外籍配偶，所以她們的老公就是「個人仲介」。

當外籍配偶來到臺灣以後，「工具仲介」會因為「生意」關係結束與距離問題而不見於其所媒合的家庭，然而臺灣的仲介卻非如此，他／她們以「諮詢者」與「教

導者」的角色存在，提供其媒合家庭對外籍配偶居留證件申請的資訊（甚至代勞申請），並且教導夫家如何「管理」與「對待」外籍妻子。為何仲介能有如此這般的影響，這與臺灣夫家如何定位仲介很有關係。

我的訪談資料顯示因為有仲介服務的需求，臺灣男性均能同意不管是「仲介」或是「媒人」都可以賺取仲介費用，如一位受訪者說：「那個幫我到印尼結婚的是我表弟和他在印尼的同事（其表弟在一間外勞仲介公司上班）……不會說我們是親戚啊不要給他賺，畢竟他也有熱心幫忙到啊，他做這個也是要賺錢啊……」。付出一筆費用給仲介被臺灣先生所認可，而他們所在意的是仲介是否可以為自己的婚姻媒合盡心盡力，提供有信用的服務。所以多數人傾向選擇身邊有從事「媒人」的親戚或朋友來幫忙，不過也有人認為「相識吃厝裡」，不如規模、有契約依據的「仲

介」來得可靠。若是覺得「仲介」或「媒人」服務的好，臺灣夫家會將這份信任感延伸，像是了解辦理居留證、身份證等的繁文縟節，「仲介」或「媒人」便是資訊來源，比如39歲的江先生，他是透過「仲介」到越南娶妻，結婚已三年多，他說：

「你說像我們也只是工人，要辦那個居留證喔，老實說是一個頭兩個大啦，要問鎮公所的人喔，他們態度沒有很好啦，以我個人感覺，仲介那邊給我的資訊喔，是比較清楚一點，且他們在幫我結婚的時候也是很有信用啊，所以我比較喜歡去問他們啦，那你只要付一些手續費，他們也是幫你辦好啊……以後我老婆要辦身份證，我一定是交給他們啦！」

江先生的話指出了若臺灣夫家定位「仲介」或「媒人」收取費用具合理性，並且滿意其服務，彼此的互動便可以繼續。此外，政府對於外籍配偶歸化流程的繁複程序更

間接鞏固了仲介提供這些家庭對於外籍妻子在台居留手續辦理的「諮詢者」角色。

臺灣夫家不只在證件申請上向仲介尋得協助，亦期望仲介能告知與外籍妻子的相處之道。林先生，39歲，是一位電腦工程師，自越南太太來台以後，他就謹記並力行「媒人」給予的建議：「我的媒人告訴我喔把她的護照先留著……你護照留著，對她不要太嚴苛，應該都不會怎樣。」另一位受訪者，35歲的工廠工人黃先生娶的是印尼籍太太，當我問他與其「媒人」婚後的互動，他說：

「他是有跟我說喔不要讓她出去，會跟人家學不好的事情，像有些人就跟朋友講電話聊天後，家裡都不顧，所以說會怕啊……我最煩惱的是她如果把小孩帶回印尼就不回來了……像我有個朋友，他娶越南的娶七年了，某一次他太太把二個小孩帶回去越南就不回來了，阿之前也是沒預兆啊……那我那個媒



人是說喔，我們最好能陪在她身邊跟她一起回去……我也不敢讓她知道我有多少錢，他（媒人）是說這樣比較安全啦！」

綜合九位受訪者的經驗，「仲介」或「媒人」教導他們預防太太「變壞」的方法包括「藏護照」、「避免讓太太單獨回去家鄉」、「阻止太太外出」、「阻止太太接近財產」等。對於這些「教導」，臺灣先生會因他們相信臺灣社會對外籍新娘污名的程度、以及本身對自己所挑選的太太的信任程度而照單全收、或是片面性採納。

這些夫家對其外籍配偶所實行的「控制」其實已見於既有的研究成果，像沈倖如（2003）、謝臥龍等（2003），然而這些「控制」僅被視為是男性霸權壓迫女性的表現，忽略了其或許是夫家對於臺灣社會污名化外籍新娘的普遍現象所作出的回應，仲介「教導者」的角色也因此變得舉足輕重。

結論

對於想跨國結婚娶妻的臺灣男性以及已娶了外籍配偶的家庭而言，仲介確實有著重要位置，且在婚後，其「婚姻諮詢者」與「婚姻教導者」的角色是顯著的。這些發現使我對於政府當前關於婚姻仲介的政策以及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有一些想法。

仲介將「東南亞女性當作商品」以及將「婚姻當作消費」的作法引起許多批評聲浪，政府如何有效管理跨國婚姻仲介業者成為矚目的焦點。2003年政府將婚姻仲介就地合法化，然此舉激起婦女團體的反彈，之後一些相關會議亦常不定期的召開。2007年1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並由行政院定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從第58條到61條的條文規定，禁止跨國婚姻媒合商業化，廣告宣傳或是賺取婚姻仲介費皆屬不法，已登記之婚姻仲介業者在這次修正案公布施行屆滿一年後

就不得再從事跨國婚姻媒合。從本文的討論，受限於語言隔閡與對跨國結婚程序的不熟悉，臺灣男性確實依賴仲介尤其是「媒人」的媒合服務，且這樣的服務並不被理解成「營利吸血」。《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或許能禁制「仲介」，卻難以管制「媒人」的私下運作，政府修法來保護國民不被剝削與保障外籍配偶人權的善意，似乎需要更多的對話來達到落實的成果。

此外，落實外籍配偶的照顧輔導措施一直是重要政策，然而從本文中發現，跨國婚姻家庭較傾向

於尋求其仲介的協助，而仲介所提供的意見似乎造成一種「拉扯」，消抵了政府對外籍配偶在臺生活權益的促進，例如「生活適應輔導班」，外籍配偶的參與即在仲介的「教導」下被夫家所限制。我想，若現階段仲介對於跨國婚姻家庭有著重要影響，是否政府能「運用」現有仲介的資源，使其成為落實外籍配偶輔導措施的助力而非阻力？

本文呈現了仲介與跨國婚姻家庭婚後的互動，這些聲音或許能提供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不同面向的思考。♥

參考文獻

1. 沈倖如（2003）。《天堂之梯？——台越國商品化婚姻中的權力與抵抗》。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 謝臥龍、洪素珍、劉惠嬰、黃志中（2003）。《國際婚姻的婚姻本質與性別權力關係的探討：以受暴的東南亞新娘為例》。發表於「性別，暴力與權力研討會」學術論文研討會。
3. Barry, K. (1995) *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4. Constable, N. (2003) *Romance on a global stage: Pen pals,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mail order' marriag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Wang, Hong-zen & Chang, Shu-ming (2002) 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Cross-border marriage business in Taiwan and Viet Na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6): 93-117.